



竣工于1931年的纽约帝国大厦是美国人口向大城市过分集中的一个迟来的见证,在其兴建的时代,成批的“逃离纽约”者带着建设这座大都会的经验,奔赴美国西海岸等地兴建一系列新城。

逃离大都会,不独属于中国的苦恼

从世界角度重审中国城市化正在发生什么



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

昱见

本报记者 王昱

“逆城市化”没到時候

眼下,对于中国“逃离北上广”思潮的解读,最流行的说法莫过于:中国已经开始“逆城市化”。

所谓“逆城市化”,指在城市化的后期,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、就业困难、环境恶化、地价房租昂贵、生活质量下降,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、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。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“逆城市化”潮流,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的美国,当时,有钱的中产阶级纷纷搬离拥挤的城市,住到城郊的别墅中去享受,只在上班或购物时才涌回城市。

但仔细比较,不难发现“逃离北上广”与这种逆城市化的不同:首先,美国逆城市化的进程是由社会的最上层发起的,他们“逃离城市”的最大动机是花同等的钱在郊区享受更好的生活。而中国的“逃离北上广”则不然,有此“怨念”的大多是二三十岁,还处在奋斗期的小白领,如《我为什么选择离开》一文所述,他们“逃离”的理由只是为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——结婚买不起房,孩子上不了学。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“为了享受而离开”有着天壤之别。

其次,也是更重要的,美国当年的“逆城市化”人群在离开城市后,其实并没有割离与原城市的联系,他们只是在卫星城或城郊居住,上班和创业依然驱车前往原城市。反观如今中国“逃离北上广”的青年们,却是一副“断舍离”的态度。早在2013年,《潇湘晨报》就曾做过一次调查,发现在有过“逃离”行动的受访者中,仅有1.43%的人是“逃”到了大中城市的郊区。与藕断丝连的美国精英“逃离者”相比,更需要大

最近,一篇名为《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:我为什么选择离开》的文章,又在网上带火了一波“逃离北上广”的节奏。甚至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,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家骥的关注。

面对压力与机会并存的“北上广”,是走还是留?这是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纠结所在,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“成长的烦恼”。然而,如果翻开世界城市发展史,比照英美等国的城市化进程,你会发现“逃离北上广”这句口号的流行,体现了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分特殊而又至为关键的十字路口上,而国内眼下大多数指路意见,其实都没摸准问题的脉门。

城市机会的中国年轻人却走得如此决绝,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种种迹象表明,如今中国的“逃离北上广”与欧美国家仍方兴未艾的逆城市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。那么,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与中国当下类似的情况呢?

有的,而且不止一次。

相似故事的不同结局

我们迁往大城市的历史,远比一般人想象的久远得多。

早在古罗马时代,地中海世界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城市化热潮。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人口之众多,不仅前无古人,而且千年以后才有来者。由于罗马只统计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,所以罗马城到底有多少人口从没有确切的数字。现代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在公元二世纪,罗马城人口至少有120万之巨。

然而,这座辉煌的巨型城市,却是一个“过度城市化”病的患者。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,这座城市因过度膨胀开始出现各种弊病,城内拥挤不堪,瘟疫横行;罗马皇帝奥勒良当政时代,仅仅一场大瘟疫,就让该城的人口降到50万。到了罗马帝国后期,为了逃避这座巨型城市所带来的瘟疫和混乱,人们开始纷纷“逃离罗马”,平民们到乡间开垦农田,贵族们则修建城堡,发展自给自足的庄园主经济。西罗马灭亡后,五世纪末的罗马大概只有五万居民,到了公元550年,罗马城内只剩下了2.5万人还在生活。

在罗马衰亡后,欧洲有近千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人口上百万的大型城市。1700年,英国伦敦号称欧洲最大的城市,但其常住人口也不过60万人。然而,紧随而来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,随着工厂的开办,大量人口开始向有限的几个大城市聚

集。1800年,伦敦人口已经达到110万,接近罗马城全盛时期的人口,随后一路狂奔,至1900年达到了650万人。城市化的狂潮也在同时席卷其他西方国家。以纽约中心区曼哈顿为例,1790年曼哈顿仅3.3万人,到1910年达到233万人。

然而,当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时,曾经困扰罗马的梦魇似乎再次降临。尤其是对于那些奋斗在底层的平民来说,社会贫富差距拉大,环境污染严重,死亡率上升,更是大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噩梦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曾深有感触地描绘那时的城市:“在伦敦,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,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,就说是地狱生活,也不算过分。”

于是,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,受够了的人们开始出现了一波“逃离纽约”“逃离伦敦”的热潮,英美各大城市的人口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减缓甚至下降。英国伦敦从1900年的650万人降到了1920年的600万。而曼哈顿人口则从峰值的233万一路下滑,到1980年已减少到142万,到2010年,曼哈顿人口恢复到158.6万人,仍然比巅峰时期人口少了70多万。

看上去,伦敦和曼哈顿似乎要重演罗马当年的悲剧,但历史没有重演。与中心城市人口减少背道而驰的,是同时代英美的城市化率却在直线上升。那些从中心城市出走的人,在各地建立了新的城市。比如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、飞机城西雅图,都是那个年代从纽约等东海岸大城市出走的各种专业人士创建的。在这些新兴城市的助推下,英美迈过了城市化率50%的门槛,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工业带。时至今日,英美依然是世界“大城市病”解决得最好的国家,纽约和伦敦中

心区域的人口都未超过千万。

让“逃离”变为“播种”

同样是因为不堪拥挤而要“逃离大城市”,古罗马城上演的是一出城市过度膨胀后猝然崩溃的悲剧。近代英美大城市流散而出的人口,却如同种子,播撒在各地后生根发芽,成长为新的城市。两个相似的故事为何有不同的结局呢?

问题关键在于两者制度设计的不同。

在罗马早期,其实也曾有过在各地“播种”新城市的良性循环。然而,这种循环在其由共和国向帝制转换时被突然打断了——出于政治上的考量,帝国统治者开始给罗马城内的公民各种优惠政策,居住在罗马城的人可以享受到比别处好得多的娱乐、医疗等福利,甚至是“免费的面包”。在共和国末期,居住在罗马城的贫民们可以半价买到粮食,到了公元一世纪,皇帝干脆免费向贫民供应必需的食品。在罗马城的全盛期,至少有30万人靠免费食物过活,这些底层平民们明知如果继续生活在这座城市,将一辈子只能在底层挣扎,却不愿意放弃身为罗马市民免费领取食品的特权,当大批民众被这种“城市特权”锁定时,偶有几位出走者也无法独立创造新城市。相反,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向罗马城的定向聚集,吸干了帝国境内其他城市的活力。最终,罗马城也因不堪重负而轰然崩溃。

与罗马的故事相反,近代英美不存在罗马式的“特权城市”,大城市中上至精英阶层下至底层蓝领,当感到城市拥挤和竞争激烈时,可以毫无牵挂地远走他乡,去环境更为宽松、资源更为廉价的新城市寻找机会。而由铁路、公路、港口等基础设施构成的近代交通网,也

为这种城市的“播种”提供了便利,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。

道理再明显不过了,如果对资源的分配能相对平均,人们就不会有对大城市“逃还是不逃”的苦恼了。

即便在现代,世界上很多城市依然患着“罗马病”:巴西的里约热内卢、墨西哥的墨西哥城,甚至法国巴黎,这些城市都以聚集了过量的人口而闻名。为什么人们宁愿忍受这些城市的高房价、污染严重、拥堵等诸多困扰,嘴里成天喊着逃离,却终究无法离开?无非是因为这些城市或因政策的偏重,或因基础设施条件使然,成为了这个国家的“特权城市”,若从其中逃离,就很难再享受那些“特权”和机会,这才让想要逃离的人如此纠结。

在明晰了世界大势后,反观自身,我们更能理解“逃离北上广”这句话的真正意味——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,在交通、能源等硬件方面,北上广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,但一说到教育、医疗等“软件”,大都依然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。如果再加上户口等管理制度,这些“软件”就几乎封住了那些已获得大城市居住权的人向中小城镇流动的意愿。这就导致了漂在北上广的年轻人只能单个“逃离”,却无法集体出走,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力,被锁死在了有限的几个大城市之中。

眼下,中国的城市化率如同当年的英美一样超过了50%,在这个临界点上,出现“逃离北上广”式的思潮是正常的。问题的关键在于,怎样正确引导和利用这些“出逃者”。但愿我们能通过深化改革,让各地资源的分配平均化,让那些“逃离北上广”的年轻人从“逃离者”变为“播种者”,在新的城市播种自己的希望,也播种属于他们的“中国梦”。